

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陈俊梁 林影 史欢欢¹

(苏州科技大学 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关系到中国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科学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寻求有效的评价方法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础保障。文章在梳理学术前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要求的5个维度,拓展出18个具体评价指标,构建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苏浙皖3个省份的40地市进行了实证评价和分析比较。研究认为:当前乡村振兴工作中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投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状况;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着力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水平;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以特色小镇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充分利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红利,为乡村振兴提速增效。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 评价指标体系 因子分析法 长三角地区

【中图分类号】: F127;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 (2020) 03-0016-07

一、问题提出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并让全体社会成员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红利。然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外部环境严峻的形势下,以乡村振兴拉动内需,从源头上促进供给侧改革成为保持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乡村振兴事业进行了总体布局 and 安排,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扎扎实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①。长三角地区在乡村振兴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其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对全国具有显著示范效应。对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质量水平的测量与比较,有助于鉴别不同经济发展条件、不同发展模式下乡村振兴的得失与优劣,有助于彼此之间取长补短,有助于积累经验供全国其他地区借鉴参考,从而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二) 研究前沿动态

近年来,我国已有学者开始关注乡村振兴领域的评价问题。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大多数研究将“二十字”总要求的5个

¹**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农村股份合作视角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14BKS059)

作者简介: 陈俊梁(1965),男,山西文水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选择;林影(1995),女,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史欢欢(1997),女,江苏丹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维度作为乡村振兴战略评价的一级指标，在二级、三级指标的选取方面，各有侧重。陈秧分等（2018）^[1]聚焦国家食品安全、农业绿色发展、全面小康等关键领域，进行指标选取。郑家琪、杨同毅（2018）^[2]基于抓主要矛盾的指标选取原则，把建设宜居乡村、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重点，充分体现了乡村振兴以人为本的要求。贾晋等（2018）^[3]指出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硬基础”，而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则是乡村振兴的“软环境”，只有两者有效统一协调，才能真正达到振兴乡村的目的，基于此系统性的视角，构建了“六化四率三风三治三维”的乡村振兴战略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方法研究方面，主要包括指标权重确定方法及评价结果计算方法。其中，指标权重的确定大多采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或将上述方法相结合的方式（陈秧分等，2018；贾晋等，2018；马历等，2018）^[1,3,4]。张挺等将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融合，以两种方法的均值为乡村振兴评价体系指标进行赋权。评价结果计算方法主要有综合指数法（陈秧分等，2018；马历等，2018；贾晋等，2018；张挺等，2018）^[1,3,5]和主成分分析法（程莉、文传浩，2018）^[6]。

综合来看，目前针对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问题的专题研究尚显不足。另外，用因子分析这种客观赋权的方法处理最新的统计数据、进行乡村振兴水平综合评价还比较少见，这些都为本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探索空间。

（三）研究对象及目的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有理由对这些地方的乡村振兴事业寄予更高的期望，期待该区域做出有价值的探索和示范性贡献。2019年12月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区域一体化规划范围涵盖沪、苏、浙、皖全境⁽²⁾，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理论上应该包括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但是由于上海市的绝对大都市特性，其乡村占比微乎其微（即便是农村占比相对较大的青浦区、崇明区，它们与苏浙皖下属的地市相比也缺乏可比性），因此，本文选择江苏、浙江、安徽省40地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作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能够客观评价长三角地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近年来农业普查及其他权威统计数据对长三角40地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做一个科学、直观的整体度量，在此基础上探究省际乡村振兴发展差异的原因，为苏浙皖三省及各地地方政府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案设计

（一）研究思路简述

本文致力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为使评价更加客观、公平、可操作，方便各地运用本研究结果进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本文首先依据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总方针，从5个维度分别设置可量化、数据来源可靠的二级指标体系，期望通过该指标体系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地方乡村振兴的风貌。

由于乡村振兴评价涉及的维度较多，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确定因子分析法为长三角（除上海，下同）40地市乡村振兴水平的评价测度方法。因子分析法是一种客观性较强、有利于发现数据结构内在联系的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发现各指标数据的内部相关关系，把众多指标用少数几个被称为公因子的变量来表示，实现降维。再依据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客观赋权，构造得分函数，计算各因子得分。经因子分析法提取后的公因子能够代表原始变量的主要信息，进而可以替代原始变量来解释一些经济、社会现象。因子分析法在各领域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中具有显著优势。

之后，本文对照指标体系搜集可以获取的最新、最权威数据，借助SPSS19.0工具进行数据处理，得到长三角40地市的乡村振兴综合得分及排名。最后，本文将根据各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的情况进行比对分析，以期总结并提取宝贵经验，发现现实的或潜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评价体系指标选取原则

指标体系的构建遵循以下原则：(1) 对接国家战略的原则，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 5 个维度为基础，结合现有成果及实际情况，设计具体指标；(2) 凸显地域差异的原则，苏浙皖三省各地农村发展存在差异性，故尽量选择具有共性的指标；(3) 突出重点的原则，指标选取尽量聚焦农村经济多元化、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城乡和谐等关键领域与重点环节；(4) 便于实际操作的原则，在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尽可能选取权威性的指标，同时，尽量选取比值类指标，避免规模差异对结果的影响^[1]。

（三）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说明

本文在陈秧分、黄修杰和王丽娟^[1]、韩欣宇和闫凤英^[7]等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遵循前述指标的选取原则，突出城乡和谐发展特色，突出农业、农村发展潜力评价特色，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所列。

表 1 长三角苏浙皖三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终极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A	农村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 A1	元
		非农林牧渔业乡村就业人数占比 A2	%
		亩均农业机械动力 A3	千瓦
		农村人均用电量 A4	千瓦时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A5	元
	生态宜居 B	农村道路路灯覆盖率 B1	%
		村生活污水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率 B2	%
		水冲式卫生厕所普及率 B3	%
	乡风文明 C	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C1	元
		拥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占比 C2	%
		离婚状况 C3	%
	治理有效 D	农村低保人数占农村人口比重 D1	%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程度 D2	
		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程度 D3	
	生活富裕 E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1	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E2	元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末家用汽车拥有量 E3	辆
		农村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 E4	%

注：A1、A2、A3、C3 为来自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C3、D1、E4 为逆向指标，将根据参考文献[8]做相应调整。

（1）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该类下设 5 个二级指标：农村人均农业产值反映了农业生产的效率水平；非农乡村就业人数占比反映了农民就业及农村产业发展的多元化程度；亩均农业机械动力和农村人均用电量体现了生产技术上的现代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反映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2) 生态宜居。生态宜居是提高乡村发展质量的保证，该类下设 3 个二级指标：农村道路路灯覆盖率反映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和水冲式卫生厕所普及率反映了村容整洁以及生活便利程度。

(3) 乡风文明。乡风文明是乡村建设的灵魂，该类下设 3 个二级指标：乡村文化繁荣程度主要通过农村居民人均文娱消费支出和农村体育健身场所覆盖率来体现；乡村传统美德通过离婚状况人口占比来反映。

(4) 治理有效。治理有效是乡村善治的核心，该类下设 3 个二级指标：农村低保人数占比反映了乡村自治实践和各地扶贫攻坚工作的进展情况；城乡收入差距程度和城乡生活差距程度从收入和消费两个角度衡量了城乡发展均衡程度，凸显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前者用农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衡量，后者用农村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比衡量。

(5) 生活富裕。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该类下设 4 个二级指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是衡量农村富裕程度，体现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农村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从物质方面反映了农民生活质量高低。

三、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及评估方法

前文已述，由于上海样本的特殊性，本文选取长三角苏浙皖三省 40 地市为评价对象。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为三省官方统计局网站公开发布的统计资料，包括 2018 年版各省市统计年鉴、民政统计年鉴等，少部分来自各省市政府网站的资料库和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由于统计数据的时延差异，除表 1 附注中特别说明外，研究时点均为 2017 年。

因子分析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利用 SPSS19.0 对 18 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指标量纲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其标准化原理公式如下：

$$X_{ij} = \frac{X_{ij} - \bar{X}_j}{\sqrt{\text{Var}(X_j)}} \quad (1)$$

其中， i 表示地区数； j 表示统计指标；表示第 i 个样本所对应的第 j 个指标的数据值； $\bar{X}_j = \sum X_{ij}/i$, $\text{Var}(X_j) = \sum (X_{ij} - \bar{X}_j)^2 / (i - 1)$ 。

第二，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使用因子分析法的前提条件是各个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在 SPSS19.0 中，主要的检验方法是巴特莱特球体验证 (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 和 KMO (Kaiser Meyer-Olkin) 测度。其中，KMO 测度作为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的重要工具，其适合度的取值范围为 0~1，数值越接近 1 说明各解释变量之间有越强的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第三，公因子筛选与命名。筛选公因子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特征值，特征值反映了该因子对变量的解释力度，一般选择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作为公因子；二是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越大解释力度越强，通常要求提取的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不低于 80%。公因子的提取数量确定后，需要对各公因子命名，为提高命名的可解释性，通常需要对因子做旋

转处理，使每一个公因子对应少数几个具有高荷载的变量，更具解释意义。

第四，计算因子及综合得分。依照成分得分系数矩阵中显示的关系，将公共因子分别表示为原始指标的线性形式，由此得到因子得分函数；用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之比作为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可得综合得分函数。

（二）实证分析

1.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利用 SPSS19.0 进行因子分析时，软件会自动消除量纲对数据的影响。

2. 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

通过 SPSS19.0 得到的巴特莱特球体检验和 KMO 测度的结果见表 2 所列。可以看到：KMO 测度的结果为 0.811，根据 Kaiser 给出的 KMO 度量标准可知原始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统计量的 P 值接近于 0，则应拒绝原假设，认为原始变量间存在较强相关性，故此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是合适的。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811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862.092
	df	153
	Sig.	0.000

3. 提取公因子

从解释的总方差表中可以看到各因子的初始特征值和经过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根据公因子筛选的两个原则，有 4 个公因子的初始特征值大于 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83.039%，再结合碎石图（图 1）的特征值分布，提取 4 个公因子是可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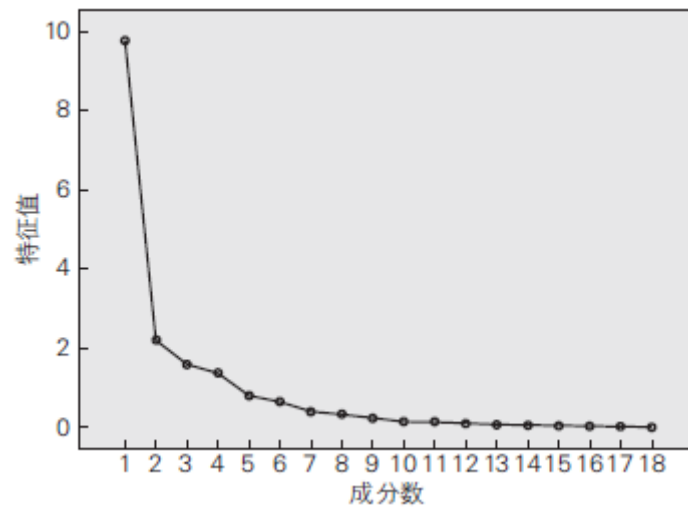


图 1 碎石图

4. 确定因子载荷矩阵及公因子命名

根据 SPSS19.0 给出的旋转处理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从全面性、系统性的角度出发,最终将 18 个原始指标归结为长三角三省乡村振兴建设的四个主要方面:综合因子 F_1 、生活质量因子 F_2 、农业发展因子 F_3 、城乡和谐因子 F_4 。第一个公因子涉及的指标解释变量较多,在 7 个指标上的载荷量比较集中,包括非农业乡村就业人数占比、农村道路路灯覆盖率、村生活污水处理率、水冲式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体育健身场所覆盖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故将第一个公因子命名为综合因子。第二个公因子涵盖的解释变量有 6 个,包括农村人均用电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人均文娱消费支出、农村低保人数占比、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农村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内涵和任务,所以将第二个公因子命名为生活质量因子。第三个公因子包括农村人均农业产值和亩均农业机械动力 2 个指标,亩均农业机械动力反映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水平,对农业生产活动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故将第三个公因子命名为农业发展因子。第四个公因子涵盖的解释变量有 3 个,包括离婚状况、城乡收入差距程度、城乡生活差距程度,将其命名为城乡和谐因子。

5. 计算因子综合得分

各公因子得分和因子加权综合得分函数如下:

$$F_1 = -0.108A_1 + 0.077A_2 + 0.081A_3 - 0.062A_4 - 0.032A_5 + 0.247B_1 + 0.239B_2 + 0.165B_3 - 0.068C_1 + 0.208C_2 + 0.049C_3 - 0.184D_1 - 0.005D_2 - 0.14D_3 + 0.133E_1 + 0.132E_2 + 0.05E_3 - 0.058E_4 \quad (2)$$

$$F_2 = 0.046A_1 + 0.042A_2 - 0.13A_3 + 0.232A_4 + 0.212A_5 - 0.124B_1 - 0.13B_2 - 0.037B_3 + 0.198C_1 - 0.119C_2 - 0.139C_3 + 0.356D_1 - 0.018D_2 + 0.034D_3 - 0.019E_1 - 0.017E_2 + 0.12E_3 + 0.211E_4 \quad (3)$$

$$F_3 = 0.445A_1 + 0.02A_2 + 0.349A_3 - 0.047A_4 + 0.08A_5 - 0.069B_1 - 0.039B_2 - 0.023B_3 + 0.13C_1 - 0.019C_2 - 0.253C_3 - 0.018D_1 + 0.144D_2 + 0.103D_3 + 0.029E_1 + 0.018E_2 - 0.169E_3 - 0.055E_4 \quad (4)$$

$$F_4 = 0.048A_1 + 0.028A_2 - 0.105A_3 - 0.008A_4 - 0.119A_5 - 0.115B_1 - 0.06B_2 - 0.025B_3 - 0.027C_1 - 0.013C_2 + 0.529C_3 - 0.019D_1 + 0.307D_2 + 0.524D_3 + 0.01E_1 + 0.019E_2 + 0.02E_3 - 0.027E_4 \quad (5)$$

$$F = (35.574\%F_1 + 25.231\%F_2 + 12.685\%F_3 + 9.549\%F_4) / 83.039\% \quad (6)$$

(三) 乡村振兴评价结果分析

将长三角苏浙皖三省 40 个地市的原始数据依式 (1) 进行标准化后分别代入因子分析得出的函数式 (2)-(6)，可以计算出各市的各公因子评价得分、综合评价得分及排名。

第一，从总体看，江苏、浙江乡村振兴水平明显高于安徽，排名前 10 的市全部来自浙江和江苏，同时后 10 名的市全部在安徽。此外，浙北地区、苏南地区具有明显优势：浙江省位列前 10 的 7 个市全部属于浙江中北部地区；江苏省位于前 10 名的 3 个市分别是苏南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且苏州、无锡包揽了综合得分排名的前两名，优势明显。这一结果也充分说明，经济是基础，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关系。通过将 40 地市综合得分与农村人均收入作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显著性水平 $P < 0.001$ 的水平下，两者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65，存在强正相关关系，亦证明了此结论。

第二，从综合因子 F_1 得分排名可以看出，浙江省在经济发展、藏富于民方面具有优势，各市农业农村市场活力比较足。20 世纪 80 年代，“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成为公认，温州模式造就了当时“商品生产蓬勃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长、

全部农民普遍富裕的巨大奇迹”^[9]；近几年，浙江的特色小镇模式又取得了不菲的成果，这些都为浙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对 F_1 所包含的 7 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简单分析发现，在其中的 B_1 、 B_2 、 B_3 、 C_2 上，浙江省各市平均水平分别是江苏的 1.3 倍、2.1 倍、1.4 倍、1.2 倍，不排除由于原始指标数据统计口径不统一对结果的影响。

第三，从生活质量因子 F_2 看，前 10 名均在江苏省，且前 6 名均在苏南地区，说明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各市农村生活相对富足、安定，这与苏南模式有密切关系。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为核心，苏南乡镇企业立足农村，支援农业，形成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产生，反过来又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良性互动局面。

第四，从农业发展因子 F_3 看，得分排名前 10 名中，江苏占 6 个，浙江、安徽各占 2 个，分别是宁波、舟山、合肥、芜湖。此结果说明江苏在农业现代化方面还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这与三省的农业发展环境息息相关。江苏多平原，而浙江山地和丘陵面积约占全省 75%，安徽的山地和丘陵面积也占全省面积的近 1/2，不适宜大型农机设备耕种，农业机械化发展短板问题十分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本省的农业现代化发展。

第五，从城乡和谐因子 F_4 得分情况看，江、浙两省的水平相差不大，与安徽省相比均具有较大优势，说明江苏和浙江长期以来注重城乡一体化政策实施，各地城乡收入、生活消费的差距较小，城乡生活同质化程度较高。同时应看到，有些排名靠前的地市（如盐城、宿迁），尽管其城乡收入和支出差距比较小（指标占优），但其城乡人均收入和支出的总量并不占优。要实现真正的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必须同时重视“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各市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 2017 年长三角苏浙皖三省经济数据为依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三省 40 个地级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1）三省及各市间的乡村振兴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均衡性，安徽省与苏浙两省差距悬殊；（2）浙江省在经济发展、藏富于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江苏省则在农民生活质量和农业发展水平两个方面具有突出优势；（3）在城乡和谐方面，苏浙两省水平相近，均领先于安徽省，此外，有相当数量的市在城乡差距（收入、支出）这个指标上表现尚可，但在人均收入与支出方面却差强人意，需要客观、全面加以看待。总体来看，乡村振兴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二）政策启示

（1）加大对农村地区投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基于文章实证部分的指标权重分析， B_1 、 B_2 、 B_3 、 C_2 等涉及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的指标对综合评价得分具有很大影响，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由综合因子 F_1 得分情况可看出，浙江在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建设方面领先于其他两省，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指出，要深入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全面推开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将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环境改善作为重点，大范围全面整治，小中心重点建设，通过示范村的引领作用，层层推进，整体提升。此外，要全面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建设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同时为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农业风险、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等提供强有力保障^[10]。

（2）深化农村改革，着力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水平。通过对评价结果的分析不难发现，作为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江苏苏州与无锡都是全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苏州、无锡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苏州、无锡等市以股份的形式将集体财产具体量化到社区每一位成员，其所建立的统一经营、民主管理、按股分红的社区股份合作组织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载体，这种做法对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各地应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充分发挥统分结

合、双层经营的优势，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积极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形成新的农业经济主体，使之既要保证个体活力和创造力，同时也要形成集团优势和组织优势，从而能够实现农村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对接，提高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水平。

(3)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研究结果显示，各市的农业发展因子 F_3 得分差别较大，说明三省各市农业现代化建设水平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性，一些排名较后地市的农业农村发展亟待发掘出新动能。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促进脱贫攻坚，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力军。要促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鼓励建立产业协会和产业联盟；发挥政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引导作用，包括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融合发展、多路径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多模式完善利益分享机制以及多形式提高发展质量^[11]；建立健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政策体系，包括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金融信贷服务、扩大保险支持范围、鼓励拓展营销市场、支持人才培养引进等^[12]。

(4) 以特色小镇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无论是城乡和谐因子 F_4 得分还是乡村振兴综合评价得分，浙江、江苏两省水平明显高于安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依靠特色小镇带动乡村振兴。乡镇作为城市与农村的连接枢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传导作用，对加速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据最新公布的 2019 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显示，前 100 名中江苏独占 30 席，浙江占 16 席，两者之和接近总数的一半。这绝不是偶然的，说明苏浙两省在特色小镇建设方面确实走在全国前列。当前，“旅游”“产业”成为特色小镇两大主题，产业类小镇需要依托既有的成熟产业，而旅游类小镇则对天然的特色旅游资源要求颇高，各地要根据区域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明确特色小镇的精准定位。旅游类小镇的文化特色在于挖掘地域文化内蕴，或植入与产业有关的特色文化内涵，以形成小镇的个性精神，例如江苏兴化油菜花海、浙江嵊泗列岛等。产业类小镇要以产业思维为引领，充分挖掘当地特色产业优势，例如义乌小商品、黄岩磨具等^[13]。

(5) 充分利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红利，为乡村振兴提速增效。2019 年 10 月 24 日，在嘉兴举行的“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研讨会上，来自长三角地区的 28 市农业农村局代表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区域合作联盟合作协议》，建议今后应根据最新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拓展政策红利到沪、苏、浙、皖全境。各地在立足个性、探寻特色的基础上，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构建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共建、共兴、共享的协同发展机制，全力推动毗邻地区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面的深度合作。尤其要加强各地在产业融合、生态保护、要素流动等关键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农业生产、生活、生态有机交融的现代农业发展；加强相邻区域的点线串联和无缝对接，积极探索各省市在新型农业人才培养、共享方面的合作机制，逐步突破长三角三省的地区界线，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怀，实现乡村振兴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陈秧分, 黄修杰, 王丽娟. 多功能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振兴与评估[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6): 201-209.
- [2]郑家琪, 杨同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8, 29(17): 38-40.
- [3]贾晋, 李雪峰, 申云. 乡村振兴战略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J]. 财经科学, 2018(11): 70-82.
- [4]马历, 龙花楼, 戈大专, 等. 中国农区城乡协同发展与乡村振兴途径[J]. 经济地理, 2018, 38(4): 37-44.
- [5]张挺, 李闽榕, 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 34(8): 99-105.
- [6]程莉, 文传浩. 乡村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 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J]. 技术经济, 2018, 37(10): 98-106.
- [7]韩欣宇, 闫凤英.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综合评价及类型识别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9): 156-165.

-
- [8]陈莉, 李姣姣. 基于 GA-PSO-ACO 综合指数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估[J]. 统计与决策, 2018(22):55-58.
- [9]柏先红, 刘思扬. “乡村振兴之路” 调研报告[J]. 调研世界, 2019(6):3-7.
- [10]欧向军, 甄峰, 秦永东, 等. 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 地理研究, 2008(5):993-1002.
- [11]韩旭东, 杨慧莲, 郑风田.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化发展[J]. 改革, 2018(10):120-130.
- [12]马仁锋, 金邑霞, 赵一然. 乡村振兴规律的浙江探索[J]. 华东经济管理, 2018, 32(12):13-19.
- [13]田勇, 殷俊, 薛惠元. “输血” 还是“造血”? 面向农户的公共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评估——基于农业产出的视角[J]. 经济问题, 2019(3):78-86.

注释:

1 资料源自中共中央、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具体参见 https://www.sohu.com/a/328756251_115926.

2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9 年 12 月 1 日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 35.8 万平方公里)。